

徐震洲譯

倫敦大學社會學講演冊

武昌榮真印書館印行

譯 者 序

這本小冊子是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教授，霍佈浩思(Hobhouse)和威士特麥克(Westermarck)二位先生就職懷特講座的幾篇講演，譯者在幾年前就把牠譯好了。只因逗留英法日久，沒得空閒把歷次的譯作一一整理就緒。近因來武昌中華大學担任商學院的教職，因此能夠抽出一部份的時間，把這本小冊子整理出來。

譯文方面，在本年的暑期前，曾由中央大學社會系主任凌霜先生參照原文代為校閱一過；並對譯者談到這本冊子所經過的時間，雖說是久長，却是還有付梓的可能性，並可作為研究社會學的參考資料，於是纔有這樣的願心把牠刊印出來。簡陋之處，尚請閱者加以特殊的原諒吧！

至於這本冊子的內容，以及担任講演的二位教授，都經了倫大校長，副校長很詳細地在卷首，來替他們作一個介紹，無容譯者再為贅述了。

這點微小的工作，譯文經了凌霜先生校對；譯名經了慕尊兄訂正；封面又經了羅家倫先生代為題署，於此都表示十二分的謝意！

徐震洲

民國二十五年雙十節序於武昌中華大學

倫敦大學社會學講演冊

目 次

馬丁懷特的惠助.....	校長儒克爾
致介紹詞	副校長柯林
近代社會學的根源.....	教授霍佈浩思
大學研究的社會學.....	威士特麥克博士

馬丁懷特的惠助

近四年來，社會學的各種課程，承懷特(Mr. J. Martin White)先生的惠助，已添設在教倫大學裏面。開始是一千九百零三年至一千九百零四年之間，第二第三兩學期由威士特麥克博士(Dr. E. A. Westermarck)及其他教授擔任了許多短的課程。一千九百零四年，威士特麥克博士聘被為本大學講師，擔任社會學的講授三年。在這個時期裡，同時有霍佈浩思先生(Mr. L. T. Hobhouse)與帥勒特博士(Dr. J. W. Slanghter)擔任講演比較倫理學及心理學(特別參証比較心理學)，又有黑登博士(Dr. A. C. Haddon)担任人種學。這些課程都設在倫敦大學經濟學院，且得到相當的成功，致令懷特先生去歲要資助我們成立一個社會學永久的講座；懷特先生的提議，為行政委員會所接受，我們就聘霍佈浩思先生担了這個講座。同時懷特先生又把行政委員會，得以將威士特麥克博士的講演，改為一個講座，存續五年；威士特麥克博士在黑生弗大學(The University of Helsingfors)担任倫理哲學的講座。黑登博士在一千九百零七年，已被聘為本大學人種學講師，定期為一千九百零七至一千九百零八年；但本大學還無常期捐款，為教授人種學之用。

本校業以捐金為基礎，規定免費生或獎勵金之制，來獎勵社會學的研究。

本校於社會學的正課程之外，又添了日本文化的三種課程：即「日本的精神」，「日本教育」，「日本教育行政」。「日本的精神」為一短的課程，在一千九百〇五年設置，由岡倉先生(Mr. Y. Okakura)担任，本校曾發刊日本的精神一書，載有默銳德斯先生(Mr. George Meredith)的序文。其餘兩個重要課程，「日本教育」與「日本教育行政」，是前日本文部大臣並東京帝國大學總長菊池大麓男爵，在一千九百零七年二月至七月之間所担任的。

本小冊的內容，為副校長的介紹詞，及社會學教授懷特就職的演講，至于菊池男爵的講演，我們希望在本年之內出版。

校長儒克爾 Arthkr W. Rücker.

介 紹 詞

副 校 長 柯 林

諸君！

我現在以副校長的資格，再作我從前作學生會長時，對於經濟學院能够有所接觸，這真是何等的愉快！

我深信在這個學院初成立的時候，必定要有人對於我們組織一個單科來作一定範圍的研究，疑為不賢明。如果有人這樣疑惑，只要他注意今晚二位教授就職的這一個社會學系，以單獨的一系，而含有廣闊的範圍，他們就可取消他們的懷疑了；因為社會學要由一切科學攝取其論件的緣故。

這個學院的第二個命名，名為政治學院；社會學可以在這個學院覺得他應有的地位，以我誠懇的盼望，若是你們的努力，不能造出政治的科學，也就不能造出科學的政治學。

社會學的界說，由二位教授來講；但其名稱，我却相信是由孔德(Comte)所創，至今還不到七十年，其科目的成立，也只有少數的大學承認。

倫敦大學是首創科學的學位，且是本國頭一個收容女學生的一個大學。因此世人都稱之為先導大學。這個先導大學，很樂意在他的一個學院裡面，設置了社會學的講座，以為其他大學的先導。

我們現在得懷特先生慷慨的惠助，能够實現此舉了。懷特先生乃是暗中作善事的人，如名譽外揚，自己總覺赧顏。他在過去三年之間，已捐助巨資于倫敦大學，充作教授社會學的用途。他又曾把我們得以聘請一位講師，在一定期間裏担任了人種學。這位講師，就是哈登博士(Dr. Haddon)。現在行政委員會又得先生的援助，得以聘請霍佈浩思先生與威士特麥克博士，來担任社會學的講座；這兩位先生即刻就要向各位演講的。

霍佈浩思先生來自牛津，(Oxford)大學，是一位久負盛名的學者並教師。他曾著有勞働運動 (The Labour Movement) 及進化道德論 (Morals in Evolution) 二書，世人皆知其名。

威士特麥克博士，關於人類結婚曾有專著，其著書也不知譯成幾多國的文字；我們與哈生弗爾大學 (University of Helsingfors) 分聘，已得其允許。最好的消息，就是在教授關於人類福利的科學上，我們得與福蘭德地的姊妹大學實行合作，他的課程不獨因此有了校際間的性質，並且有了國際間的性質。現在我介紹霍先生與威博士向諸位講演。這是很愉快的一回事！

近代社會學的根源

教授 霍佈浩思

社會學在科學上，還沒有取得很幸福的地位；他對於他的研究方法和對象，還不能不作種種的討論。有些人絕對的否認社會學不是科學；有些人把他看作與經濟學，政治學，或歷史爲一物；有些人以爲他的主要研究只是野蠻人的習慣；有些人以爲他的特別研究只是現代勞働階級的情形。其實這些研究都只是社會學的輔助研究，都不能完成一個以人類全社會生活爲其研究範圍的科學。以人類全社會生活爲其研究範圍的科學，究竟是什麼科學呢？這一種科學究竟能不能夠成立呢？這只有用事實來證明。關於科學的範圍或關於社會性質的抽象的討論，對於我們研究的開始，沒有什麼幫助。科學的範圍或社會的性質，是要看我們怎樣填實我們的定義來定的；至于怎樣填實定義，是要我們繼續用實際的研究工作，纔能逐漸發見的。我們或者可以鄭重地在思想史上探索社會學的根源，因以充分了解他的現狀和將來。社會學的知識所需要，是近代社會進化的特徵；社會學的智識的發展，與社會發達的其他過程，有密切的關。我們係認識現代社會學主要的根源，由考察這些根源怎樣生長，怎樣在基礎底下錯綜，怎樣正在共同生長，而且形成比較明確的形態，那就已多少明瞭我們研究的對象是什麼？應該研究的是什麼了。

我現在要在時間所允許的範圍內，很簡單地把社會學研究的四種根源指明出來。

從年代上說，從邏輯上說，政治哲學的研究都應當站在第一的地位。這政治哲學的研究可以溯到希臘的時期；但近代的形態却是形成於十七世紀，與那時代的政治和宗教的鬥爭有密切的關係。

政治哲學普通的性質怎樣？與社會學研究又關係怎樣？

政治哲學也同其他一切哲學的分支一樣最初只是分析我們通常認

爲我們所熟悉，而構成我們所居住的世界，形成我們被圍繞的精神社會的環境，那些普遍而單純的概念。他們只研究一些政治論上所普遍流行的平常事項，如法律與自由，權利與義務，國家與個人之類。這裏有許多觀念，是我們所常用而難于明確解釋的。如果要我們解釋就祇好回答一句老話：『若是你不詢問我們，我們是很明瞭的』。但政治哲學都要努力這種解釋的工作。政治哲學爲兩百多年間的特別工作，就是在分析那作社會之基礎，構成社會紐帶之一般的要素的普通概念。但重要的，就是我們要注意政治哲學的問題，在大體上沒有更變，而政治哲學實際承續的系統——在這一方面，英國也曾有過充分的出產——却是與歷史的環境密相結合而產出的。他們與他們當時的政治問題，是有不可離的關係的。那些哲學家的看書，縱然不是有意，在結果上也是由他們當時政治問題來充滿的。因爲他們各人所看見的政治問題不同，縱使他們的理論在根本上是一樣或極相接近，而他們所產出的結論也極不相同。在霍布士(Hobbs)社會契約的概念成爲絕對專制制度的基礎，因爲霍布士是要對於議會革命(Great Rebellion)時代反叛議員(Paliament)的態度，給與哲學解答的緣故。與這極相近的一種概念，再過一世代，又被洛克(Locke)用來說明社會契約，不是人民用以將自己的權利送給帝王的契約，因之不是用以將帝王置之於絕對威權之地位的契約；這是帝王與人民之間的一種約定如其詹姆斯第二與以破壞了，英國議會可與威廉第三再訂立其他條款的一種契約。以後盧騷又用這社會契約說來作了許多不同的概念的基礎。羣衆的主權和人的權利，在他的學說裡面就占了最高的地位。無論政府的形態是怎樣，也無論文明爲他的子孫所鍛鍊的鉗鍊是怎樣，人類總是生而自由，生而平等的；政府並不是人民的主人，在正道理上只是人民的公僕。這種概念如果是盧騷從他對於社會契約的分析演繹而來，那就要歸功于他們用以說明十八世紀中期，法蘭西革命感情的聰明之力。他們的內容，有四分之三是從愛國的法蘭西人，所處特殊的環境而來，是從他們對於他們祖國的將來，不能不認知的變化的性靈面來。

若是我們回到英國來考察白色姆(Bentham)這個急進主義之父的學說，我們一樣也找得出一行新的思想，是因新的需要而來。白色姆最初並不是急進主義者，只是一個守法律的改良家。他看見了許多詭辯的法律家，其所持的政治哲學，都只有用于維持陳腐的惡習。他要掃除那些無聊的理論，就應用『法律之目的，與人類一切行為一樣，在招致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公例(這公例不是他所發明的)，樹立了改良法律的一個簡單明瞭的常識原理。他以為這是一個唯一而十足的標準，即原理使一切法律在經驗中受簡單的試驗。及至後來他見着沒有權勢者來贊成他的，只有反對的，他就擴張他的思想，並由一個多溫和的政論家，進而變成了一個政治的急進主義之父。彼用他以前的那個觀念，來作了攻擊支配階級之政治上，及其他承受的利益；至于那個最大幸福的原理，附上『各個人只有一個人的價值，沒有一個人有一個人以上的價值』的說明，成了當時政治上民主主義的簡單而有力的公式例。

功利主義是白色姆所稍微大胆地陳述的，後來又為小密爾Younger mill 所思議。密爾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時代政治上的需要。這個時代就是改造第一期已經完成了，而又看見了中等階級的支配，不能實現天國的時代。這個時代的情形，使人知道政治問題，不是白色姆公例所說的那樣簡單，反是關聯民主主義的理想的時候，我們不能不設法斟酌人類的差別和社會生活的複雜來作說明不可。最後進到我們的時代了，纔有一個思想家格蘭(T.H.Green)，再由極不相同的源泉，並且再以實際狀況的觀察為目的，出了他哲學的思想。這個狀況，現在就是近代自由主義的困難地位。近代的自由主義，遭着滿切斯特派Manchester School的教義的興盛，在這些教義已經充分發揮了他們的效力，契約的自由和競爭的公平待遇這一類的觀念，已經再不能發揮改造的能力時代，所處困難的地位。格蘭之竭力想出一個新的契約，新的自由，新的公共福利的理論，明明是與自由主義的這個困難地位有關。

我們要找例子，很容易找出例子來，但我在上面所舉的例子，包

括英法的政治哲學發展上大部分的重要人名，就已足夠指明在政治思想實際問題間之密切的關係了。我們可以這樣說：在方法上說，政治思想家分析概念，與形而上學者，及道德學者是一樣，但從目的與結果上說，都比他們的成績大。他分析我們所據以生活的實際狀況，結果造出了我們所應據以並社會爲之生活的理想。這種理想的要素，自革命時代以來，已是顯著地見于一切哲學之中；但同樣的傾向，在早期的思想家，一樣也很明白看得出來。他們一樣也不僅關心實際的基礎，同時也關係社會的道德基礎，社會生活問題，在他們一樣方面，又是倫理的問題。

我們現在再追索社會學的第二個根源。這第二個根源可以叫做歷史哲學，我想我能夠用一個概略的敘述，把他與第一個根源的關係表明出來。

第二個根源的關係，多少帶有反撥的性質。我們在上面雖然只說了當時的問題，對於政治思想家的影響，但政治哲學的要求，却在一般的應用。在何伯，洛克，或盧騷這類的思想家，歷史是沒有需要的。他們是不管他們所想像厚生的狀態是不是真真有過的——何伯自己也就這樣說——也不管他們所主張的變換，是不是社會的進化程度所能容許的。他們生在近代各種研究還沒有發生以前，實在也沒有我們現在所利用的這樣多的歷史材料，來使他們達到那種目的。況且進而研究社會在歷史的進程中所生的變化，如他們所感覺的，也不是他們真真的工作。他們的方法不是歷史的和比較的方法，乃是分析的方法。他們注力於那作社會並基礎的概念。但他們離開空間與時間的關係，只由他們的分析得出結果，來作一個真理的體系。這種態度的極頂，就是密爾所稱的數學方法。這種方法把社會科學可以當作幼克尼德（Euclid）科學一類的體系來研究，由若干自明的原理出發，藉抽象的演繹進到更複雜的命題，由是漸漸兒蓋盡了社會的領域。這種方法自有他相當的地位和相當的適當，但他亦有相當的範圍。這些範圍，因法蘭西大革命事實的進行，要思想家都明白覺悟了。

社會契約說的原理，被應用於實際的時候，馬上就知道了抽象的

推理，不能在實際生活上得到數學般精確的結果；擬得最好的憲法，有時也要因哲學家們所慣於拋棄於計算之外的，那些人性上實際上的障礙，而不能適用。有些人知道這一點了，就發生很強烈的反動，來反對一切革命的論理；但同時也有些人，很細心地去考察為什麼這樣簡單明瞭的論理，一到了現諸實行，就會失敗了。始終信仰一種合理的社會組織人們，對於實現這種社會組織的方法，非漸次抱起極不相同的一種意見不可。過去時代的普通革命觀念及其傳說，以前由他們看來，都只是一個累贅，障礙，航海時的年老人，為文明人看見了，必然發肩的。這種觀念，不是不像雪萊 Shelly 在後一個世代在「怕羅米賽的解放中」所給與的說明。這個世界是被鎖索細縛于希臘主神的管轄之下的。如果這個管轄消滅了，一切人就都會親愛起來，一切事物就都充滿了快樂。被壓的人性，就像被開放的泉水一般的興起。公理與和平相互接吻，世界一切的人民都歡享其自由，都像親生的兄弟一般，在一種普遍歡呼的跳舞裡來結合起來。

人民把壓迫他們的一切勢力推翻的時候，這種狀態為何沒有在（例如）法蘭西實現呢？像康獨色特 Condorcet 這一類的人，在監牢裏等死的期中，曾作這樣想。他們的解答在大體上，進步的途徑比預想的，是崎嶇長彎曲。種屬的完成力，永久是一個理想，完成決非一跳就能達到了。反是，我們非把人性實際的進步，當作一種與一定條件有關係的東西來看不可。社會的理想不是單由論理上的方法所能達到，反是非與人類的經驗立在密切的關係上不可。而最重要之點，就是某一社會的理想，因其社會之政治的及社會的情形不同而不同。我們應當拋棄完全的正義，可以由一個大革命的變化而達到的觀念，以採取一個隨一定的條件而進的極漸進的進步的觀念。更進一步，我們對於某一社會，非以其最能助次段進步的制度為理想不可。這種制度在一國一國，要因其國之歷史的發展不同而不同。英國的制度，若不加以實質的變更，就不能適用於法國人的生活。歐洲的理想，更不能無變更的適用於未開化種族的政治；就是亞洲人民也不能適用。如果進步是按照某種法則，一步一步走的一種東西，這法則的發見，馬

上就要成為信仰人類進步的人們的問題。於是被輕視的過去，就成為對於將來的鑰匙。歷史就成為人類興趣的中心，但這裏所說的歷史，比朝廷及戰爭的歷史的意義要廣要深，人類由幼年期進到成年期，經過若何的階梯？幼稚期的終末在那裏？成年期的意義是什麼？其生長的基礎的條件是什麼？什麼東西是促其進步的？什麼東西又是阻滯其生長並啓其壞滅的？——等等的解答，就在這裏面。不過我們要解答這些問題，不僅需要歷史，還須要一個歷史之哲學的解說。

這種解說，必須要有他自己的立脚地，我們也必須要在人類自己的發展的概念中，找出一個基礎來解釋人類心靈的大問題。不然，歷史的哲學就要陷于思考，成為腦筋裏面造出來的解說，以人類為實體的諸多作用之一。普通形而上學的系統，譬如黑格爾（Hegel）就以之我們現在所還無法追索的一種發展的結果。他的歷史哲學就是在普通形而上學的原理之上成立的。但在孔德（Comte）的研究，人類進步自身就成了哲學問題的中心，及宗教的信仰，道德的習慣，和政治上治國的基礎，特別的成了社會學的基礎，或者也可以說單獨就成了社會學的本體。如我們大家之所知道，這社會學一語是孔德發明的。這社會學一語，前半截是拉丁文，後半截是希臘文；名字的構造是混雜的，其所代表的學問自身的起源，也是同樣混雜的。比較進步的社會構造的基礎，其根源在羅馬。社會的哲學，與其他一切哲學一樣，發源于希臘；而法律及政治，都是羅馬對於世界上，給與的主要供獻。所以在用意自身和最初使用這語的目的中，就已經多可把這種不同的要素的混合表示出來。社會學一方面有政治哲學家們，所曾作過的社會概念的分析，一方面有使人察知人類發達的事實，記錄的堆積；一方面有社會生活的廣闊而且普遍的情形，一方面有各時代的人類思想和人類制度所採的許多形態；一方面有理想，一方面又有不完全發展的被限定的狀態。孔德之所着手，及對之作了一條爛而且在（許多方面）一切實有根據的貢獻問題，就是綜合這些要素，他的方法是社會學真正的方法——即一方面細心地分析概念，一方面扼要地達觀歷史的事實，而把這兩方面融合起來。但他為什麼沒有用這方法得到更多結果？這

是我們最重要的問題。

其比較的無結果，多少是由于某種人類的弱點。用多少帶有剛性的定見來形成其體系，對於一種科學，在其極幼稚的時期，就給以完全或成熟的定型，這是孔德的個性使然。在歷史科學這一種複雜的研究中，沒有一個天才（無論是怎樣偉大的天才）能够發見一切真理的，或最重要的真理，這是由常識也可以知道的。無論怎樣偉大的學者其所能做得到的最大限度，都只播點種子，讓別人來耕作，來灌溉，很遠的後代人增其繁殖。但這不是孔德及其後繼者作研究的目的，因之，他的體系也就成了禁阻進步的刑具了。

但我們深深探求這個禁阻的一般原因，我們又可以發見近世社會的第三個根源。這第三個根源，我們可以在物質科學的發達中來尋出。

我們達觀社會學的歷史，可以知道社會事物的思索，怎樣受大影響於當時的自然科學的研究。自然科學的影響，我們在一般哲學中也可以尋出。無論是形而上學或社會學，都還沒有走完辯証法的階段，進到了科學的階段；也無論是人們在這兩個階段，不為自己找出新的真理，而要解說自己時代的思想；但一切最滋育最進步的科學，都必有大影響於當時的一般思想，這是事實。這般影響並不專於哲學和政治學。我們在十七世紀看見了數學上及物理學上的大發見，不僅對於哲學，都給與極大的影響。同樣在十八世紀，數學的方法支配了社會。但在那世紀的進程中，物理學及化學的大進步，為生物學的發展開了坦途；到了十九世紀的中期，關於生物進步，就完成了一個新的思想，無論其實際真實的程度若何，至少也是把有機體進化的思想，由天上拿到地下來，與真實的事實發生了接觸。

生物學的觀念在思想上所占的優勢，為物種原始一書所造成，一直繼續到我們現在的時期，對於社會學的思索，就給了很顯著的影響。斯賓塞爾（Herbest Spencer）的勞作，特別有大功于使社會學的觀念流行於英國，但同時又給了一個大的動力，使這些新科學傾于為生物學之附屬。生物學家者，關於有機體進化的根源，其相互間意見，雖然各有不同，但以生物學的原理供給于社會的論件，則一。斯賓塞爾

的生物學方面的主要批評家——韋塞門 Weismann 的門徒——其斯賓塞爾的氣味，比研究社會進化的斯賓塞爾本人，還要厲害，這是很值得注意的。總而言之，在自己的領域內奏了凱旋的科學的一切威勢都來影響了研究社會學的新方法。社會問題的解答，都參照了那為社會生活之基礎的生物學的原理。大家都相信生存競爭，自然淘汰，及適者生存，是這地球上一切可能的進步關鍵。無論是什麼政治的問題，無論是什麼立法的提議，一切解決，都要看提議的方法，會不會妨碍生存競爭，保存不適者，因而損壞自然為種族的進步所設精良武器的效力。這個假定會得着許多應用。他可以用于鼓勵產業上的自由競爭，斯賓塞爾自身就這樣用過。他可以用于社會與社會的競爭。就是說一個社會裏，不應有什麼立法來妨碍強者的勝利，同樣兩個社會之間，也不應有什麼人道的感情主義，來妨碍那叫弱者失敗的自然而健全的進程；但這樣的應用，說也奇怪，斯賓塞爾却沒有作過。這個假定實在可以用於辯護一切種類的成功，駁倒關於正義的一切不便的抗辯。因此這個假定不似馬上就會消滅的。但若我們在理論學上應用他，必不免要引出奇異的結論來；因為人們都會知道，自從世界開始以來人類所作的一切文明，都是要終止或減少原生的生存競爭的緣故。僅只法律和警察的存在，當我們出去作事的時候，就可阻止強者在大街上，把我們推到了污泥中，並阻止持短棍的人，強奪我們身上的錢和錢袋。如果更極端的生物學的方法的代表者，沒有達到主張一切政府和法律都須廢除的結果論；那就只是因為他們沒有把法律和政治的問題加入考慮之內。經常是很容易看掉那構成我們所生息之環境的一部分的各種制度，並很容易忘記把我們適用於比較不熟習的事情的批評適用這些制度的，但在事實上，法律的單純的存在，不僅在限制生存競爭的範圍，並且在根基上，是要轉變在現在還存在的競爭中成功的條件。現在露頭角的人，已經不是最強的人——亦且也不必是最好的人；都只是最能利用他所生息之社會的制度所給與之機會的人。因此實際的制度越適於社會公理的要求，就越能使最適於救濟社會的人站在最高的地位。人們知道了社會組織越高，這社會組織所保護的最優的品質，